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內衝突起因之探析：政治與經濟的革命？

The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s

doi:10.30390/ISC.201409_53(3).0003

問題與研究, 53(3), 2014

Issues & Studies, 53(3), 2014

作者/Author：平思寧(Szu-Ning Ping)

頁數/Page：61-8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09_53\(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09_53(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東北非地區的國內衝突起因之探析： 政治與經濟的革命？*

平 思 寧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阿拉伯之春是於 2010 年年底，由突尼西亞開始發生一連串位於包括中東與北非地區的國內政治動盪事件。多數人認為，這與當地的威權政治，以及經濟發展遲緩有高度相關，因此，本文首先探討中東北非地區內戰可能的發生原因，包括經常被提及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另外再輔以中東北非地區特殊的區域環境解釋，包括了此區特有的豐富天然資源，以及造成此次阿拉伯革命的連鎖反應。作者發現，經濟發展非常顯著地影響著內部衝突發生的機率，包括良好的發展以及開放的貿易政策，而民主與衝突則顯示「倒 U 型」的分布，過渡政體是最容易發生內部衝突的政體，而從威權到過渡政體間的衝突機率是升高的，而從過渡政體往民主的衝突機率則減少。自然資源的產出與衝突有顯著的正相關，但是並非意味著此區生產最多的原油是引戰的原罪。最後，本文證實在此區衝突的傳染力是存在的，但僅限於「鄰國」，若超越了國界，這樣的感染力也隨之消失。由於本研究為從 1946~2012 年，研究對象包括 24 國的時間序列與橫斷面資料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TSCS)，以及依變數為二元類別變數 (binary outcome variable)，因此採用廣義估計方程式 (General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作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關鍵詞：內戰、民主、經濟發展、中東北非

* * *

* 本文曾發表於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與會先進的指導，以及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老師以及張文揚老師，給予作者許多建設性的意見與指正，亦感謝本文的匿名評審所提出的批評指教，使本文能夠更為完整呈現。

壹、導 言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①是指多個中東北非地區(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 MENA, 後文均簡稱 MENA 地區)^②國家自 2010 年年底由突尼西亞開始發生一連串的國內政治動盪事件,^③此區可謂是現今世界發生內部衝突最多的地區之一。因此,從彼時開始的動盪,使得該地除了反恐活動之外,又將國際社會的眼光聚焦在該區的內部衝突當中。內戰的研究相較於國際衝突,缺乏相對成熟以及一致性的理論典範(例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其延伸理論等)來解釋,但是近年的發展卻也枝繁葉茂,學者們提出許多對於國家內部暴力可靠的解釋。^④本文所要提出的疑問是:針對 MENA 地區近來頻繁發生的武裝衝突,以過去文獻中所討論造成衝突的因素,是否在此區同樣具有相同的解釋力?而本區是否有其他的特徵導致衝突的發生?

例如,民主的推動以及經濟發展的促進是否可為減緩此區衝突的解決方式?乍看之下,民主化似乎是此次革命的原因之一,^⑤此區國家多處於獨裁或過渡政體,鮮有民

註① 或稱「阿拉伯革命」。

註② MENA 地區是個跨洲且超越地域界線,而以區域內語言、種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劃分的地區,因此,在 MENA 區域內的所屬國家,常有不同的定義。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也因此經常將「中東」與「北非」兩區放在一起討論,因此有 MENA 的簡稱。由於國際間對於 MENA 國家的定義莫衷一是,作者為避免爭議,將主要討論的 MENA 國家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定義作為劃分,將 21 個國家納入 MENA 區域內,包括(依字母排列):阿爾及利亞(Algeria)、巴林(Bahrain)、吉布地(Djibouti)、埃及(Egypt)、伊朗(Iran)、伊拉克(Iraq)、以色列(Israel)、約旦(Jordan)、科威特(Kuwait)、黎巴嫩(Lebanon)、利比亞(Libya)、馬爾他(Malta)、摩洛哥(Morocco)、阿曼(Oman)、卡達(Qatar)、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敘利亞(Syria)、突尼西亞(Tunisia)、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巴勒斯坦(West Bank and Gaza)、葉門(Yemen)共 21 國。但巴勒斯坦在本文的資料庫內,尚未被承認為獨立國家,因此本文在操作上,共有 20 國,請參考世界銀行(World Bank)網頁下國家分類中的「中東與北非」:<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COUNTRIES/MENAEXT/0,,menuPK:247619~pagePK:146748~piPK:146812~theSitePK:256299,00.html>。檢閱日期 2014 年 9 月 15 日。

註③ 針對內部衝突有很多不同的用詞,包括內戰、內部武裝衝突、國家內部暴力等等,但由於本文採用計量分析,所有的觀察值(案例)均由所採用的資料庫所提供,因此一切由資料庫所定義為主(請見第參節「統計方法與資料」的第二小節「內部衝突」的討論),但本文做理論性探討時,內戰、內部衝突等詞,是可互換的概念,本文就不再另予定義闡述。

註④ 內戰研究在近十年內非常興盛,相關研究甚多,作者僅指出與內戰兩大理論:第一是認為內戰的開端是由於「不滿」或「憤恨」(grievance),主要是由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的研究代表,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75-90; 而另一派則是 Paul Collier 與 Anke Hoefler 的「貪婪(greed)說」或稱「機會」(opportunity)說,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 No. 56 (2004), pp. 563-595, 這些是較有系統地解釋內戰的起因,而其他的文獻多由個別變數來解釋內戰的起因,可參見本文第貳節的討論。

註⑤ 蔡秀勤、張佑宗,「阿拉伯之春的啓示與反思」,《臺灣民主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頁 199-210; 林雅瑩,「中東民主化浪潮與未來挑戰之研究—從茉莉花革命探討」,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主國家。⑥突尼西亞的領導人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於下台前已在位超過 20 年，埃及總統 Hosni Mubarak 在位近 30 年，利比亞的 Muammar Gaddafi 自 1960 年代晚期開始統治利國，而 2012 年末開始因內戰造成國內人民死傷慘重的敘利亞，⑦ 1970 年起長期被 al Assad 家族統治。觀微知著，似乎民主化是衝突開端合理的解釋，然而若吾人斷定威權是本區內發生衝突的主因，而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又是特例，⑧這兩國比突尼西亞更缺乏政治自由，但 2010 年底革命的起源卻不是從政治最不民主的國家發生；而或許經濟發展也必須被考慮，因為突尼西亞的經濟表現比這兩國更為低落，⑨因此，吾人是否可以斷定，本區的政體以及經濟發展程度，是主宰著國內政治穩定的主因？還是有其他尚未觸及的區域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釋此區的衝突爆發？

因此，本文首先以過去所普遍認可的內戰原因，來檢視在此區究竟是何種因素，形成 MENA 地區的國家內部衝突？除上述經常被討論的政治、經濟因素外，MENA 區域具有一特徵：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是研究其他區域的內戰時，較不會考慮到的因素；此外，此次阿拉伯革命的連鎖反應引起本文研究的興趣，即過去文獻所陳述的衝突所具備的「感染力」(contagion)，特別在 2010 年底開始，MENA 地區的動亂，無論何種原因，暴力的確蔓延。因此，本文以過去文獻分析內戰的可能因素，再加上 MENA 特殊的區域特徵，來解釋此區國家內部衝突可能的因素，而衝突的起因可以幫助吾人了解導致該區內部矛盾的真正原因，進而尋求改善的方式，而本文也將依據結果提出政策建議。經濟計量學模型 (econometric models) 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旨在尋求此區發生內戰的模式 (patterns)，提供較具一致性與通則性 (generalization) 的解釋與答案，並以 MENA 地區共 20 國為主要研究對象，資料的觀察值涵蓋 1946 年到 2012 年此區所發生的內部衝突。

註⑥ 目前學界對於國家民主的研究，在民主與獨裁之間，另有一過渡政體的分類，稱「無政體」(autocracy)，指國家民主化尚未完成，因此陷入民主與威權中間的範圍，Lars-Erik Cederman et al.,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377-394. 若使用目前學界經常將政體指標化的「政體資料庫」(Polity IV Project, 以下簡稱 Polity IV)，其中國家政體的測量標準為 21 個級距，-10 為極威權，10 為極民主，極權與民主為光譜的兩端，中間共 21 個級距 (對此資料庫的介紹請見第參節有關政體的介紹)。若作者採用 Quan Li 與 Rafael Reuveny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4 (2006), pp. 941-942) 的見解，-6 分以下代表威權，+6 分以上是民主國家，那麼以 2010 年的數據觀察，MENA 國家僅有兩個民主國家：以色列與黎巴嫩；威權國家包括巴林、伊朗、科威特、利比亞、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其餘是處於-6 到+6 的過渡政體，由此可知，在此區的國家，仍以非民主國家為多數。

註⑦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able News Network, 後簡稱 CNN) 至 2013 年 4 月 2 日的調查，在敘利亞內戰中死亡的人數已近 7 萬人，<<http://edition.cnn.com/2013/01/08/world/meast/syria-civil-war-compare>>。檢閱日期：2014 年 9 月 15 日。

註⑧ 根據 Polity IV，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在 2010 年擁有民主分數最低的-10 分，屬最威權的國家。Monty G. Marshall and Keith Jaggers, *Polity IV Dataset* (College Park, M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D, 2002)。

註⑨ 世界銀行以經濟情況對國家的分類中，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都是高所得國家，而突尼西亞為「中低收入」國家，請見世界銀行「國家與經濟」資料庫<<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本文共有四節，除了本節導言之外，第貳節將回顧過去對於內戰研究的不同論點，包括過去經常討論到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等因素，還有本文的控制變數等可能被忽視的相關討論，並藉此推論出本文所欲陳述的理論。第參節是統計資料、變數介紹，以及解釋本文的統計結果，包括本文發現經濟發展的確與內部衝突的可能性顯示顯著的正相關；再者，政治情況呈現比較複雜的結果，但是民主的程度與衝突亦相關。最後是結論的部分，作者根據統計結果給予此區衝突方面的政策建議。

貳、內戰的起因

在探討此區國內衝突的原因前，內戰究竟如何發生的是吾人必須先釐清的。傳統上，族群、政治以及經濟因素向為導致內戰的三大原因。研究內戰爆發的原因甚多，除了上述的因素外，以下作者參考過去文獻所提及的其他可能，以及參考 MENA 地區特殊的文化，作為檢視此區國內衝突的控制變數。

一、多元種族

種族雖然不是本文的主要變數，卻是開始研究內戰第一個著手的因素，特別是族群多元的國家。因此，有些實證研究發現，種族是導致內戰的主要原因，^⑩社會文化價值分歧導致內部衝突的原因不難理解，諸多族群位於同一政治體（國家）內的認同差異，導致發生衝突的機會升高。對於「族群」的議題，許多學者都進行了更細膩的分析，例如以「極化」（或稱「對立」，*polarization*，國家有兩個總人口不相上下的民族）代替「分裂」（*fractionalization*）的概念，或是不同族群間的地理距離，^⑪來研究族群對於內戰的影響，例如多元並不是社會團結的絆腳石，種族的對立才是導致內戰的原因，而過去研究的種族分裂是誤導學者們對族群與內戰的理解。因此，族群的多元分裂不是重點，重點是在社會分布中，出現族群「對立」的現象，^⑫不是族群多元的國家就較單一族群國家容易發生衝突，因為正是這種多元的環境，導致沒有任何一個種族團體會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央政府相抗衡，而種族團體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又因族群的多元而導致成本太高，因此不是多種族就容易發生衝突。^⑬

註⑩ Michael Bleaney and Arcangelo Dimico, "Incidence, Onset and Duration of Civil Wa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redit Research Paper*, No. 09/08 (2009), 請見 <<http://www.nottingham.ac.uk/credit/documents/papers/09-08.pdf>>, 檢閱日期：2014年9月29日。

註⑪ Jose G. Montalvo and Marta Reynal-Querol, "Ethnic Polarization, Potential Conflict, and Civil W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795-796.

註⑫ *Ibid.*, pp. 795-816.

註⑬ Halvard Buhaug,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6, 2006, pp. 691-708; Scott Gates, "Recruitment and Allegiance: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Rebell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75-90.

以貢獻內戰案例大量來源的漠南非洲 (Sub-Saharan Africa, SSA) 來看，族群的衝突或許為內戰埋下伏筆。^⑭然而，探討 MENA 地區時，作者發現族群這個變數做為導致此區發生國內暴力衝突的論述可能不足：第一，族群是否影響內戰的爭論，在上述的文獻已可清楚發現，族群並不是被廣為認可的內戰發生必要起因，而條件性因素太多，亦會使得研究過於瑣碎。例如在我們力陳種族（無論是多元或對立）是導致內戰的重要因素時，我們仍須補充說明不自由的政治制度或較糟的經濟環境也是發生衝突的必要條件時，就降低了「族群」這個變數本身的可信度。第二，若暫不討論族群在內戰研究中顯著性的爭議，「族群」這個變數在 MENA 地區意義不大，^⑮因為此區本身即是一個文化、族群、宗教以及語言同質性非常高的地區。以現狀而言，信仰上大多數國家均信奉伊斯蘭教；^⑯語言上也多數使用阿拉伯文做為至少其中之一的官方語言；^⑰種族上，多數國家的民族仍為阿拉伯族。^⑱本文在選擇 MENA 國家做區域研究時，統計結果即有案例選擇上的偏頗，因此，在此族群同質性甚高的區域，「族群」的變異量 (variation) 不大，結果也不具太大的意義。

最後，在未進行計量分析之前，作者回顧過去在 MENA 發生的內部衝突的個案，起因可歸咎為種族問題的案例為伊朗與伊拉克境內的庫德族 (Kurds) 問題。^⑲另外，非阿拉伯族群占多數的吉布地的確可以將其發生於 1991 到 1994 年間的內戰歸因於族群問題，但是此次內戰還包括了政治上的因素，不全然是因族群而導致。於是這等於回到「族群」與內戰的爭議討論，即便兩者有關，但必須加上許多的條件因素。因此，就過去案例的經驗，MENA 內部衝突的原因，其實族群不能說是顯著的變數，本文將藉由實證分析得出相關結論。

更多的學者去找尋族群以外的解釋變數，也顯示其實族群這個單一變數是不足以解釋內戰的爆發，需要太多其他附加的條件，包括經濟與政治條件。^⑳ Fearon 與 Laitin

註⑭ William Easterly and Ross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 No. 4 (1997), pp. 1203-1250.

註⑮ 所謂的「變數」就是必須具備「變動」的特質，讓吾人觀察其變動是否會對依變數產生影響，若研究的變數不變，那麼也就無法斷定依變數的改變是否來自該自變數。

註⑯ 以色列信奉猶太教，馬爾他信奉羅馬天主教。當然，即便同為同一種宗教，伊斯蘭教也分為許多不同分支，包括了最大的遜尼教派 (Sunnis) 以及什葉教派 (Shia)，對國家基礎方向意見紛歧的世俗派與基本教義派等，但以大方向而言，此區在宗教上仍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如歐洲地區。而作者未將此區宗教「派系」列入主要解釋因素有兩點：第一，現有文獻不足。沒有足夠的系統性證據支持「派系」是導致衝突的主因；第二，與「族裔」的理由相同，高度的條件性讓學者們仍將主力放在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研究上。

註⑰ 除了以色列與馬爾他不使用阿拉伯語外，還有伊朗雖信奉伊斯蘭教，但使用波斯語作為官方語言。

註⑱ 以色列為猶太國家，馬爾他為馬爾他人，伊朗多為波斯人，吉布地國家內有約 60% 的索馬利人是多數。資料來源：美國中情局出版《世界概況》內的國家資料 (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註⑲ 若將巴勒斯坦視為獨立國家，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衝突可視為國際衝突。事實上，以巴衝突比較近似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特別是例如世界銀行已經把巴勒斯坦的國家資料單獨列出為「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 (West Bank and Gaza)。

註⑳ Halvard Buhaug,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pp. 691-708; Gerald Schneider and Nina Wiesehomeier, "Rules that Matt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iversity—Conflict Nexu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2 (2008), pp. 183-203; Benn Eifert et 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2 (2010), pp. 494-510.

於 2003 年證實種族不是衝突的主因，而將內戰歸咎於幾個其他的因素。他們對內戰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不滿」(grievance) 的概念才是內戰的主要原因，並非族群多元與否，而這樣的不滿又可大致歸因為政治與經濟上的不滿製造一個有利於叛亂的環境，因此，在 Fearon 與 Laitin 研究推翻種族是內戰原因實證上的可能性後，政治以及經濟因素成為內部衝突研究的主流，本文亦將政治與經濟因素，作為主要的解釋變數探討。

二、政治制度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上節所討論社會分裂所造成的動亂，部分原因來自於在現今的政治體制之下，少數族群 (團體) 感到他們的代表性不足 (under self-presented)，在無法為自己民族有效地發聲的情況下，使用暴力來推翻政府成為他們能夠改善現今政治經濟環境較為可行的手段。實際上，若國家無法提供正式的政治管道讓人民抒發不滿，對任何族群團體，暴力同樣是唯一可改變現狀的可行手段，因此，本節主要討論「政治制度」與內戰的關係。除此之外，衝突也可能由於社會上充斥較多的政治機會 (political opportunity)，國家領導人上台與下台時間的不確定性存在時，就會引起國家內部挑戰者對國家領導職位的期待，進而掌握適當的機會製造衝突，讓現任領導人下台。因此邏輯上，降低領導人任期或制度上的不確定性，也就是減少了對國家權力有野心反對者的政治機會，進而使得內戰不易發生，^①換言之，就是國家若進行定期的民主甄選過程，那麼這樣的政治甄補是可以被預期的，則不需要冒險以暴力活動來奪得政治職位。

既然如此，那麼在經驗上民主是否就是解決內戰的良藥呢？國際關係研究中有所謂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推崇民主的價值。^②然而，被忽略的事實是，國家民主化的過程，卻非常容易產生衝突，^③特別是內戰。第一，民主化是大眾的動員，特別當政府當局並沒有準備讓群眾參與政治時，動員這麼多的人情況就容易發生暴力衝突。^④第二，民主化可以為政治菁英動員這些因民主化而擁有權力的人民，而

註①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Andrea Ruggeri,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3 (2010), pp. 299-310.

註② 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論述，不是民主國家「不會」開戰或不會與他國發生戰事，而是在實證的檢驗上，同為民主體制的國家較不傾向以戰爭做為解決彼此爭端的主要手段，因此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較低，但是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之間還是會發生戰爭的。有關「民主和平」與國際衝突的著作可參見：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297-337;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5-38;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1995), pp. 79-88。

註③ 請參見前註以及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註④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過程中可能必須要塑造出一個敵對的形象才能促成民主化的成功，^⑤因此，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衝突與敵對，甚至仇恨都可能作為民主化的副產品。

再者，Buhag 區分了內戰不同的類型。不論叛亂團體的動機為何，他們都會有追求的目標 (goals)，據此對中央政府有所要求。總體而言，可分為兩種目標：第一是目的在「政權」(governmental conflicts)。這類的內部衝突是有關政治體制 (political system)，叛亂團體追求的是奪取政權並取代中央政府，或是改變它的組成成分。而第二類的「領土型」衝突 (territorial conflicts)，則指叛亂團體追求的是部分領土的高度自治權利，甚至是提出分離國土的要求。^⑥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民主政體可以讓「政府型」的內戰不容易發生，因為民主或許不能完全消除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但是給予人民參與並成為政府一員的可能性，但是這卻無法遏止目的在領土分裂的內戰，因為民主的多元特質，卻會讓種族間加重他們「認同」的情感，甚至會超越對於國家的認同，因此，民主制度對領土型的內戰並無幫助。回顧自 1946 年起 MENA 國家發生國內領土分離的案例並不多，可能部分原因也是由於此地高度的文化同質性。案例包括如上一小節所提的庫德族問題，^⑦其他還有伊朗境內靠近亞塞拜然 (Azerbaijan) 地區的分離運動，^⑧摩洛哥的西撒哈拉 (Western Sahara) ^⑨問題等。

因此，似乎民主政體並無法直接證實可以有效地避免內戰，^⑩而獨裁國家也未必是

註 ⑤ Havard Hegre et al.,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2001), pp. 33-48;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Local: The Diffusion of Conflict,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註 ⑥ Halvard Buhaug,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p. 692。作者參考「武裝衝突資料庫」(有關此資料庫，請參考第參節「內部衝突」)，從 1946 年到 2010 年，該資料庫記錄的 367 件國內武裝衝突案例中，其中有 48% 是屬於領土型衝突，而另外 52% 屬於政權型的衝突，雖以政權型的衝突為多，實則相差無幾。一個國家內可能會發生多起不同叛亂份子發起的內戰，訴求的目標也會不同，而也有可能是以分離主義為號召，進而威脅到整個國家政權生存的案例。

註 ⑦ 庫德族為在中東國家內分布的游牧民族，包括伊朗、伊拉克、以及敘利亞等國，種族上以及語言上與多數的阿拉伯人不同，唯獨信仰均屬伊斯蘭教。伊朗的庫德族分離運動在 Ruhollah Khomeini 時期遭到嚴重的武力打壓，直至 1997 年後，伊朗國家領導人才逐漸開始尊重庫德族文化，並開始鬆綁該族的政治權利，使得該族的人民亦可成為伊朗政治菁英的一部分，但是部分的伊朗庫德族人仍在尋求自治甚至獨立的契機，也因此伊朗與境內庫德族人的衝突並未完全解決。而伊拉克境內的庫德族人，在經歷了 1980 年代後期的 Anfal 種族屠殺，以及第一次波灣戰爭後一個相對較弱的伊拉克政府後，終於在 1991 年 10 月，伊拉克的庫德族自治區正式成立，擁有實質上的獨立。

註 ⑧ 伊朗境內的亞塞拜然區的分離運動不同於一般所認知的分離運動，該區的獨立是由於蘇聯軍隊進入扶植了一個短暫的自治政權，然而不久後，隨著蘇聯軍隊的撤出，亞塞拜然地區又回到伊朗的管轄下，並且沒有想要分離或獨立的企圖。

註 ⑨ 西撒哈拉地區問題至今仍然無解。摩洛哥在與茅利塔尼亞的戰爭後獲得此區的大部分管轄權，然而，此區尋求西撒獨立的武裝份子 (Frente Polisario, 或簡稱 POLISARIO) 仍佔有部分的西撒地區，兩造尋求和平的協議未果，而摩洛哥仍不願放棄對該地主權的宣稱，於是出現現在僅有少部分國家承認西撒獨立的特有狀況。

註 ⑩ Halvard Buhaug,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pp. 691-708; Gerald Schneider and Nina Wiesehomeier, "Rules that Matt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iversity—Conflict Nexus," pp. 183-203.

點燃戰火的絕對要素。但是介於民主與獨裁中間的轉型國家才是最危險的。例如，在確認民主與內戰關係的研究中，發現轉型期的國家，特別容易在短期內發生內戰，但是究竟民主或獨裁那個政體會更容易導致內戰卻無法被證實。^①在實証上無法有效解釋的情況下，學界偏向解釋似乎獨裁國家畢竟較民主國家不穩定，更容易將國家推往政體的中間點（也就是之前所提的「無政體」，在 Polity IV 中介於-6 與+6 之間的政體），也是極度容易發生內戰的地帶，^②若以國家穩定的觀點來看，雖然在實證上民主制度無法顯著地被認為與降低內部衝突有關係，但是在規範上，民主社會畢竟比威權穩定的多。第一，民主制度所能夠提供人民不滿抒發的管道，也就是至少可以抒解所謂的不滿；第二，民主政體健全的制度，也可避免有心人士對國家領導權進行非法的競逐（例如政變），進而發生衝突。第三，政治競爭本身就是充滿著衝突，無論民主或是威權社會，但是民主國家將政治競爭制度化，也就是以多數人同意的遊戲規則來進行競爭，在制度的框架下較不容易出現騷動，而這些特點都是其他政治制度所無法辦到的。^③第二與第三點也是之前作者所提及的「政治機會」。但是僅論及政體對內戰爆發的關係時，無政體才是最容易引發衝突（conflict-prone）的政體。^④

回到 MENA 地區的案例，此區的政治制度範圍從最不民主，到最民主的國家都有，當然民主國家較少，非民主國家佔大多數。若以 2010 年到 2011 年此區的民主情況而言，仍處於威權狀態的有巴林（君主制）、科威特（君主立憲酋長國）、利比亞（現在為過渡政府，臨時議會共和，但在 2011 年前，多年採取一人軍事獨裁）、摩洛哥（君主制）、阿曼（君主制）、卡達（酋長國）、敘利亞（威權共和），阿聯（聯邦），這些威權國家有我們所認知的傳統威權政體，有因為當地獨特的文化傳統而產生的酋長國，也有處於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的民主轉型期國家。吉布地與伊朗在 21 世紀之前才達到民主國家的要求，而阿爾及利亞在 2004 年起才脫離非民主國家的行列。而埃及更是自 1946 年起，民主實施的情況時好時壞。^⑤這次阿拉伯革命，部分原因被歸咎於長期的威權統治，但從之前的討論發現，推廣民主價值是否是降低衝突的解決之道尚未有定論，但是在從威權過渡到民主之間的過程卻是充斥暴力，因此，似乎民主程度與衝突可能呈現「倒 U 型」的分配，在對此區的衝突做出結論之前，本文將以實證來分析自 1946 年以來 MENA 的國內衝突，以及此區政治制度的相關性，不僅可以檢

註① Havard Hegre et al.,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pp. 33-48.

註② Scott Gates et al., "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Polity Duration, 1800-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4 (2006), pp. 893-908.

註③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 75-90.

註④ Edward N. Muller and Erich Weed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Violence: A Rational Ac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4, No. 4 (1990), pp. 624-651;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Local: The Diffusion of Conflict,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註⑤ 對於民主以及非民主國家的定義，作者參考 Polity IV 的數據，有關政體的部分則是參考 CIA 的「世界概況」資料。

視過去文獻對於民主與衝突的討論，也可對於此區做出政策上的貢獻。

三、經濟情況

除了政治上的不滿之外，人民經濟水準低落，更是造成不滿的一大主因。經濟不振而使得人民不得不選擇推翻現任政府的邏輯理所當然，因此，除了政治制度外，經濟發展多是學者們研究內戰的重點。學者 Collier 與 Hoeffler 長年以「經濟途徑」(economic approach) 來研究內戰。雖然貧窮導致人民紛紛起義看似理所當然，而透過實證研究也發現，低落的人均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以及緩慢的經濟成長都容易造成內戰的發生，³⁶而理論上為何惡劣的經濟環境會導致國家內部暴動發生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基本上，人民不滿 (經濟) 現狀，自然會在累積至某種程度而採取某些措施，這是作為人民自保的手段，除了貧窮是必要條件外，啟動暴力的機制還有另一個要素，就是作者要探討的第二個原因：機會成本。貧窮使得非政治菁英願意鋌而走險以暴力等非正規方式推翻現有政權，正是因為貧窮的生活降低了內戰所需要的「機會成本」。若是人民的生活水準相當高，而失業率又低，那麼人民當然不願意放棄現有的優渥生活而參加叛亂活動，而當收入低落，或失業率飆升的國家，就算是高教育程度的人民也會願意參與暴力活動，³⁷意味在生活條件惡劣的情況下，人民已經不在乎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失去的，為了精神或物質上的目標，會更願意一搏，特別是位於社會或政治結構下層的人民，想要經由暴力來達到財富重分配或社會階層重新洗牌的動機會更為強烈。第三，從政府的角度考量。富裕的國家可以進行某些所費不貲的改革計畫，藉著發放公共財 (public goods) 等方式，減低人民的不滿；而貧窮的國家沒有資源來進行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促進或維持治安的措施，而這剛好營造叛變的有利環境，所以當國家的財政狀況良好時，政府可以賄賂的方式 (例如提供免費教育、基礎交通設施等)，來發放公共財或收買人心，避免在第一時間被叛軍推翻。³⁸

除了人民所感受到的經濟條件影響起義的意願之外，國家的經濟制度也是導致內

註³⁶ 例如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pp. 75~90;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pp. 563~595; Edward Miguel et al.,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4 (2004), pp. 725~753; Halvard Buhaug,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pp. 691~708; Havard Hegre and Nicholas Sambanis,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mpirical Results on Civil War Onse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4 (2006), pp. 508~535; Michael Bleaney and Arcangelo Dimico, "Incidence, Onset and Duration of Civil Wa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hristopher Blattman and Edward Miguel,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10), pp. 3~57; Indra de Soysa and Hanne Fjelde, "Is the Hidden Hand an Iron Fist? Capitalist and Civi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3 (2010), pp. 287~298.

註³⁷ Michael Bleaney and Arcangelo Dimico, "Incidence, Onset and Duration of Civil Wa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fraim Benmelech et 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Suicide Terroris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4, No. 1 (2012), pp. 113~128.

註³⁸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Leader Survival, Revolutions, and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Fi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4 (2010), pp. 936~950.

戰可能爆發的因素。同樣以「機會成本」的觀念來考慮，de Soysa 與 Fjelde 以「經濟開放」程度來解釋內戰的發生，^㉔主張若一國採開放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那麼該國面對內戰的風險會較低。原因在於內戰往往打的不是社會正義（justice-seeking），而是獲利性。換句話說，叛亂團體會在行動前先行評估，認為此仗的勝利會為他們帶來的利益，遠大於他們參與戰爭的風險，那麼衝突不可避免。在市場不開放且高度計畫經濟的國家中，企業所獲得的報酬是相當不可靠的，當國家無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property rights）時，那麼無論平民或是武力團體，都無意依據正常的貿易管道來維持生計，也就是說，政府的經濟制度設計封閉，再配合不良的經濟表現產出，培養了內戰的溫床。

政治與經濟狀況，無疑是內戰討論中最被接受的普遍起因，但是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又產生了另一個疑慮。當實證上發現貧窮的國家容易發生內戰後，那麼似乎改善貧窮就是消弭戰爭的重要手段，但是改善經濟狀況的訴求又引發了另一個辯論，與政治制度相似的問題再度浮現，亦即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自由市場是否就是解決內戰的有效方式？雖然在實證上的支持稍嫌薄弱，但是大家基本上能夠同意民主政體是避免內部衝突的重要政治機制，雖然在轉型的過程中會導致更多的衝突與政治機會的產生。經濟發展也有相同的疑慮，資本與自由市場的開放對於經濟發展是有正面的幫助，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途徑上，開放市場卻會對國內的穩定帶來某種程度上的衝擊，甚至成為內戰爆發的誘因，此種現象被稱為「內戰的分布理論」（Distributional model of civil conflict）。^㉕然而，長期而言，與民主制度相似，許多學者仍然對經濟開放的前景抱持樂觀的態度，無論是國家發展還是降低衝突。^㉖再者，在針對族群衝突的研究中，也發現開放市場對於衝突的消弭也是有正面的幫助，因為當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越深，族群間互相的恐懼以及不安全感會降低，藉由信任的增加而減少衝突的可能。^㉗簡而言之，人民的經濟水準與衝突的爆發息息相關，而市場的開放程度卻是仍在

註 ㉔ Indra de Soysa and Hanne Fjelde, "Is the Hidden Hand an Iron Fist? Capitalist and Civil Peace," pp. 287-298.

註 ㉕ Bussmann 等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往資本主義邁進時，短期內遇到國家內部不穩定的現象勢必定會存在的，因為在與全球其他國家（包括已開發以及其他開發中國家）經濟整合的過程中，衝突是可能的，包括來自國外，以及國內社會的不滿。但是以長期而論，特別是在國家經濟重建計畫結束後，資本開放市場的政策將會為國家經濟帶來正面的效果，Margit Bussmann et al., "Foreign Economic Liberation and Peace: The Case of Sub-Saharan Af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4 (2005), pp. 551-579; Margit Bussmann and Gerald Schneider, "When Globalization Discontent Turns Violent: Foreig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07), pp. 79-97。Bremmer 也提出了所謂「J 曲線」的概念，在極度封閉（例如北韓等威權政體）以及極度開放（例如美歐等已開發國家）的社會穩定度會比較高，這是在 J 的兩端，而處於中間位置（意即 J 的底端）則會出現不穩定的狀態，也就是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中，社會不穩定勢必的過程，Ian Bremmer, *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註 ㉖ 國際關係理論中有「貿易－和平理論」，認為貿易開放政策所帶來的貿易量以及國家發展，都會讓衝突的成本增高，因此會降低內戰發生的機率，Margit Bussmann and Gerald Schneider, "When Globalization Discontent Turns Violent: Foreig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l War," pp. 79-97。

註 ㉗ David Steinberg and Stephen M. Saideman, "Laissez Fea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on Ethnic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p. 235-259。

討論的議題。MENA 地區國家人均收入的差異也頗高，有卡達的 104,300 元美金，到葉門最低的 600 元美金，^④在人均收入差異性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本文將此作為第一個經濟的主要解釋變數，檢視 MENA 地區的經濟表現，是否誠如文獻中所討論的，帶給人民極大的不滿；另外，本文也將貿易開放程度列為第二個討論的經濟因素，雖然目前自由經濟對於一國的政治穩定還再討論，本文試圖從這個區域，對貿易自由化的可能結果做出些許貢獻。

四、其他因素（控制變數）

政治與經濟因素不僅僅是本文主要的解釋變數，也是大多數內戰研究的探討主題。然而，本文所研究的區域特色，也是必須納入考量的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另外兩個變數作為控制變數：自然資源以及衝突的蔓延性。此地區除了伊斯蘭教高度的同質性外，自然資源的生產是本區備受矚目的另一個要素，而究竟「自然資源的詛咒」（Natural Resource Curse）^④是否在 MENA 地區獲得確認，是本篇文章所欲探討的。另外，自 2010 年底開始的阿拉伯革命是具有延續性以及傳染力的暴力事件，而傳染的力量部分來自於現今網路世界的發達，但是，是因為現代科技的興起而導致暴力衝突高度的傳染力，還是由於衝突本身就具有向外擴張的特質？本文也將一併納入研究的範圍。

第一，自然資源。若內戰的引起只是由不滿所引起的，那麼所謂的自然資源的詛咒便是相當可能的因素。自然資源的詛咒指的是國家若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那麼該國的發展便很可能遲滯，而政府效能也會相當低落。自然資源的收入是屬於國家的，此種收入是直接由出口本國自然資源獲得，相對於國家的其他收入，例如從人民身上所獲得的稅收，自然資源所得的收入相對輕鬆許多，因為國家稅收是跟著民間的經濟活動而變動，當一國的經濟水準低落，當然政府也無法從人民的收入中獲得太多的收入，而因此活絡經濟是政府存續的當務之急，唯有人民賺錢，政府才能收稅，並將國家收入以各種不同的型態（例如公共財等）回饋予公民。也因此，若政府從自然資源出口所得的收入佔政府總收入比例越高，那麼國家的經濟發展繁榮與否，與政府運行就沒有太大關係了，因為就算人民處於貧窮的狀態居多，也不影響政府運行的效率。

註④ CIA「世界概況」所提供人均收入的估計值全球排名（由高而低，括號內是全球排名）：卡達（1）、科威特（24）、以色列（37）、沙烏地阿拉伯（4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48）、巴林（49）、阿曼（50）、馬爾他（52）、黎巴嫩（87）、伊朗（103）、利比亞（109）、突尼西亞（119）、阿爾及利亞（138）、伊拉克（141）、埃及（144）、約旦（151）、摩洛哥（156）、敘利亞（159）、吉布地（181）、葉門（187）。請參考世界概況「國家 GDP per capita」資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4rank.html?countryName=Algeria&countryCode=ag®ionCode=afr&rank=133#ag>>。檢閱日期：2014年4月1日。

註④ 自然資源詛咒主要指的是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在發展方面會較資源貧瘠的國家慢，本文藉由此概念來檢視是否資源豐富的國家也容易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對於自然資源詛咒的文獻相當多，請參考 Jeffer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p. 827-838; Frederick van de Ploeg,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2 (2011), pp. 366-420; Michael L. 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2 (1999), pp. 297-322。

由此得證，高自然資源所得極有可能使得政府失去發展的動力，帶來貧窮以及緩慢的成長速度。此外，政府也有可能因為如此唾手可得的資源，而忽略了國家進步的基本建設，例如教育。由於自然資源所帶來繁榮的經濟數據，政府若無前瞻思維而過於自滿，忽略最基本的建設而不予投資，長期而言對經濟仍是負面的損害，最後，貧窮的人民會感到不滿，因而失去對現任政府的支持，而政府為了繼續存續，很可能會採取威權的政治制度，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府（或國家領導人）可以自然資源的收入來賄賂一小部分（可以決定政府存續的團體）人民來達成繼續執政的目的，因此，高自然資源的收入可能會導致不民主的國家，以及普遍的貪污現象。^⑤這些原因都是可能招致人民不滿而導致衝突的產生。MENA 地區有豐富的石油礦產，此區超過半數國家蘊含石油也成為此區最大的特色之一，^⑥因此，以自然資源的產出來檢驗此區，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第二，內戰的蔓延性。為何衝突會如傳染病一般向周邊國家擴散呢？當一國發生內部動亂時，會使得鄰國遭遇相同衝突的機會大增，其理由不難理解，包括了相鄰的邊界，難民的流入、武器的流通等等。相鄰的邊界使得資訊以及難民的流入相對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容易，難民會使鄰國的社會秩序改變，帶給鄰國同樣的社會動盪，進而發生相同的內部衝突。再者，內戰國叛亂分子的訴求，可能帶動其他國家人民對自我意識的甦醒，使得同樣的口號一呼百應，造成區域性的不安。也因此，許多鄰國都傾向對內戰國採取干預，因為內戰國家的動盪實際上已經嚴重威脅到鄰國政權的存續，或者國家的安全。^⑦而 MENA 國家在此次革命中，的確是造成一波革命風潮，迄今未決，學者在研究這樣群聚（cluster）出現的內戰現象，主張傳染效應並非事實，衝突群聚是由於相同族群間的聯繫，才是導致傳染的原因，特別是分離戰爭。^⑧然而，群聚現象還必須端看區域內每個國家的特徵，若鄰國已為高度經濟發展與民主成熟的國家，那麼自然蔓延的風險較低，而這又回到內戰主要的政治與經濟討論了。本區域內因分離主義所造成的內部衝突案例不多，但是族群同質性非常高，因此本文同樣地以

註⑤ Edward N. Muller and Erich Weed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Violence: A Rational Action Approach," pp. 624-651; Thorvaldure Gylfason,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p. 847-859; Ibrahim Elbadawi and Nicholas Sambanis,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3 (2002), pp. 307-334;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pp. 563-595; Michael L. Ross, "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3 (2004), pp. 337-356.

註⑥ 此區內共有 14 國盛產石油，包括阿爾及利亞、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亞、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葉門，所謂的「盛產」是指這些國家所蘊藏油量必須足夠探勘以及做商業出口，請參考 Europa World Online 2009，<<http://www.europaworld.com/entry/mena?authstatuscode=202>>。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註⑦ Jacob D. Kathman, "Civil War Contagion and Neighboring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10), pp. 989-1012.

註⑧ Halvard Buhaug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Contagion or Confusion? Why Conflicts Cluster in 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6 (2008), pp. 883-901.

「衝突的蔓延」作為控制變數，來探討 MENA 地區過去迄今的國內衝突中，鄰國（或區域）的角色是否亦為顯著因素。

根據過去文獻所提出的可能因素，以及根據本區獨特的區域特色，作者將檢視政治與經濟（本文主要解釋變數），以及其他包括族群、自然資源，以及衝突的傳染力等控制變數，來檢視是否其對 MENA 區域動亂的觀點，在實證上能夠獲得證實。

參、統計方法與資料

本文的資料為時間序列與橫斷面資料（或稱「縱橫資料」）（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TSCS），而依變數為衝突的發生與否，為二元變數（binary variable），在該國該年發生過內部衝突，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因此，本文的計量模型受到依變數為類別變數（categorical variable）以及縱橫資料的限制，故採用「廣義估計方程式」（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 GEE），^④觀察自變數的改變對依變數機率（likelihood）的變動，而所有模型的係數（coefficients）也不具有直接解釋的意義。

一、統計資料與變數

表 1 的敘述統計，可以看出本文所採納變數的基本可參考數值。例如，「國內衝突」、「族群」、「鄰國蔓延效應」以及「區域蔓延效應」等四個變數，都是採取「二元變數」的編碼方式，有發生為 1，沒有則為 0，以「衝突」為例，當年有發生國內衝突的編碼為 1，若無則為 0。因此，此四變數的值不是 0 即為 1，平均數只是參考該變數多傾向「發生」或「未發生」。而「石油租金占自然資源租金比例」為「比例」，因此最大值僅為 1，並非是二元編碼方式，而此比例的平均數約為 0.68，意謂此區半數以上的自然資源收入，都是通過石油的出口而來的。

政體的範圍從 0 到 20 顯示民主的程度，而本區顯然多為不民主的國家（平均數為 4.47）；人均 GDP 與自然資源租金都是連續變數，因此需觀察其變動才具有意義。而「政體」與「經濟發展」的兩個變數的平方值，均因模型的需要而建立的，不具有實質上解釋的意義。

註④ 廣義估計方程式是由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梁廣義以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生物統計學家 Scott Zeger 的共同研究，而本模型主要是應用於生物統計方面（例如醫學），但由於此模型的方便簡易，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學者採用此模型於政治學（包國際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研究當中。此模型主要的便利性在於，無論依變數的類型為何，廣義方程式均可適用，不會受限於依變數是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或類別變數的限制，且不會因此改變統計的顯著結果。Kung-Yee Liang and Scott L. Zeger,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Using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Biometrika*, Vol. 73, No. 1 (1986), pp. 13-22。

表 1 敘述統計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國內衝突	.1594406	.3662145	0	1
政體	4.472744	5.208829	0	20
政體 (平方)	47.11184	96.36925	0	400
人均GDP	6958.409	11701.46	64.01036	92501.49
人均GDP (平方)	1.85e+08	6.38e+08	6169.893	8.56e+09
經濟開放程度	76.46316	33.86845	2.4	251.139
經濟開放程度 (平方)	6991.906	7055.443	5.76	63070.74
族群	.2272727	.4192146	0	1
自然資源租金占GDP比例	24.36848	22.8562	0	116.051
石油租金占自然資源租金比例	.6779882	.3703026	0	1
鄰國蔓延效應	.7060117	.4557537	0	1
區域蔓延效應	.9120235	.2833647	0	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計算。

(一) 內部衝突

本文有關於內部衝突的爆發採用「二元變數」。在研究「衝突」時，有幾個資料庫廣為學者使用，包括「戰爭相關資料庫」(Correlates of War, COW)，以及UCDP/PRIO Armed Conflict 資料中數個衝突相關的資料庫。由於本文屬於區域內的量化分析，樣本數上已經較少，而COW在資料蒐集的時間上為期較短，而在作者希望擴大樣本數的情況下，首先消去COW。UCDP/PRIO Armed Conflict 資料庫主要是由瑞典Uppsala University 研究，而作為提供奧斯陸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衝突資料的主要學術單位，由於此資料庫更新速度快，因此已漸漸成為學界在研究國際關係時的資料主流來源，本文採用資料庫內的「武裝衝突資料庫」(Armed Conflict Dataset, ACD)。^⑩ ACD 涵蓋所有類型衝突的爆發(onset)，包括國際衝突(inter-state conflicts) 與國內衝突(intra-state conflicts)，本文的依變數來自於本資料庫扣除國際衝突後的觀察值。ACD 定義「衝突」的發生有幾個要素：第一，衝突必須有關於奪取政權或是領土；第二，衝突必須牽涉至少兩方，而其中一方是政府；第三，衝突必須導致至少 25 人死亡。^⑪ 只有符合以上條件的衝突，ACD 才將其納入資料庫，但 ACD 又區分了這些衝突為小型衝突(minor conflict) 以及戰爭(war) 兩種，小型衝突為在一年中因衝突死亡的人數介於 25 到 999 人之間，而 1000 人以上的死亡人數，ACD 便

註⑩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UCDP) 資料庫內涵非常多的衝突資料，除了本文所使用的 ACD 外，相近的資料包括 Onset of Intrastate Armed Conflict, UCDP Conflict Termination 等資料庫，同樣地，本文由於限於區域研究，因此作者意在盡可能擴大樣本數，因此選擇 ACD 資料庫。

註⑪ 請見 ACD codebook，頁 1，<http://www.pcr.uu.se/digitalAssets/124/124920_1codebook_ucdp_prio-armed-conflict-dataset-v4_2014.pdf>。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認定此衝突為戰爭。^②在 ACD 的 329 件的國內衝突中，約有 74% 的衝突屬於小型衝突。本文則納入小型衝突以及戰爭的總和以擴大本文的觀察值，觀察資料時間涵蓋 1946 年到 2011 年。^③

（二）政體

相較於種族語言以及文化上的高同質性，MENA 地區的政體差異性就比較大，從表 1 的政體變數可知，區域內有得到民主評分最高的國家，也有最不民主的國家，但是一般而言，仍是不民主的國家居多。本文在檢驗政體的顯著性時，採用 Polity IV，其優勢在於政治學界對於此資料庫的使用非常廣泛，不僅資料蒐集的時間足夠我們觀察一個國家長期間的政治發展外（相較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所提供的數據，Polity IV 的資料時間確實較長），完善的政治民主與威權的指標也讓學者們在研究複雜的國家政體時有一個比較可信的依歸。

透過之前有關民主對於引爆衝突的討論，多數學者認為威權到過渡政體之間是爆發戰爭的關鍵，意味著衝突與民主程度間的關係有可能呈現非線性的「倒 U」分布，即過渡政體是最容易發生衝突的，而威權或民主的政體都呈現較低可能性的衝突。因此，作者根據倒 U 分布的特性，調整了 Polity IV 的編碼方式，首先，此資料庫是根據民主的特性給予 1 到 10 的分數，另外也根據威權給予 1 到 10 的分數，總體相加給予 -10（極威權）到 +10（極民主）總共 21 分的指標，本文將變數做全正數的轉換，將 -10 到 10 的指標轉換為 0 到 21。而本文除了將 Polity IV 的政體變數以全正數呈現外，再將政體平方後成為另一個變數（政體平方），以檢視倒 U 型的關係。

（三）經濟發展

本文以兩個變數作為經濟發展的代理變數（proxies），第一個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人均 GDP 是衡量國家經濟狀況廣泛被使用的變數，也可以代表人民所得的變數，因此本文納入人均 GDP 作為第一個經濟條件的變數。第二個是經濟開放程度。經濟開放制度的本身保障了國內人民的財產權，使得經由本身努力提高生活水準的可能性大增，也因此減少冒險參與叛亂活動的可能性，除了如第貳節的經濟情況所提及之外，願意採取經濟開放制度的國家，政府也比較願意採取保護人民產權的政策。另外，開放的經濟活動使政府與人民雙方增加參與衝突的風險。經濟開放的國家代表對外經濟活動的仰賴，而戰爭是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阻礙，政府不願冒著長期損失稅收的風險（包括關稅、人民所得稅收等），而人民更難以負擔因戰亂所帶來的直接損失。因此，開放程度越高的國家，衝突的可能性將越低。兩個經濟

註② 同註①，頁 9。檢閱日期：2014 年 4 月 1 日。

註③ Nil Gleditsch et al.,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5 (2002), pp. 615-637; Lotta Themner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1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4 (2012), pp. 525-536.

變數的資料均取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④單位是美金。而經濟開放程度,本文採用總體貿易金額(包括進出口)占總體生產總額的比例,亦即觀察貿易為國家經濟產出帶來多少貢獻,這是衡量經濟開放程度的選項之一。此變數資料同樣取自於世界發展指標。另外,與政體變數相同,作者以同樣方式檢視是否人均 GDP 的結果與政體相符,均具有「倒 U 型」的非線性分布,因此在人均 GDP 外,另做一平方變數作為檢視的變數。

(四) 族群

本文對「族群」所採用的編碼方式,是採「對立」的方式評斷一國族群的分裂(請見上述有關「族群」分裂的論述)的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例如,一國中有兩個(或以上)在人口分布上可以達到一定程度近似的國家,那麼編碼為 1,相否為 0。本文採用,若一國某一優勢族群人口無法達到 70%全國人口,那麼就是 1,若該國人口超過 70%均為某特定族群,那麼編碼則為 0。資料來源為美國中情局出版「世界概況」。^⑤

(五) 自然資源

MENA 國家中許多國家生產原油,或因為石油運輸等原因使得該國的經濟因此受惠,本文目的不在檢視自然資源是否阻礙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或是民主進程(雖然這兩者很可能是導致內部衝突的主要因素),本文將直接觀察自然資源對於內部衝突的關係。然而,從表 1 可以看出,此區國家仍存在無自然資源出口的國家(自然資源租金的數值為零),而本文不以自然資源生產的「產量」作為代理變數,而以從這些自然資源所得之「租金」(rent)來觀察其所帶來的效應,包括了石油,天然瓦斯、煤、其他礦產、以及森林資源。^⑥本文不採用以自然資源租金總量,而代之以其占 GDP 的比例,來衡量政府從自然資源獲利的多寡而影響國內衝突的可能性,因為自然資源與

註④ 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請參見<<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檢閱日期:2014年4月1日。

註⑤ 「世界概況」給予的資料僅限於當年,但作者研究,MENA 地區的固有族群以阿拉伯人為主,以人口的結構而言,是歐洲國家最大的勞力進口市場,許多 MENA 區域的移民移往歐洲,而近年由於 MENA 富裕國家的積極建設,也湧入許多南亞勞工,但至本文完成之時,阿拉伯族仍是 MENA 國家的多數人口(除了上述所提非阿拉伯文化國家),另外,人口結構的改變十分緩慢,因此,「世界概況」所提的資料仍可溯及既往。有關 MENA 地區移民,以及人口結構改變文獻,請參考:Philippe Fargues, *Emerging Demographic Pattern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igration through 2030*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8);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Y: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pp. 18~19.

註⑥ 根據世界銀行“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對「石油租金」的定義,石油租金是世界原油生產價格,以及總生產價格的價差,自然資源亦然,請見世界銀行網頁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ETR.RT.ZS> (檢閱日期:2014年4月1日)。

GDP 的比例，可以明顯看出一國對於自然資源出口的仰賴。⁵⁷

$$\frac{\text{自然資源租金總額}}{\text{國家GDP總額}}$$

另外，由於本區盛產石油，本文亦欲測試石油是否為本區的衝突帶來較自然資源更重要的影響，因此另外建立一個變數，石油租金占自然租金的比例：

$$\frac{\text{石油租金}/\text{GDP}}{\text{自然資源租金}/\text{GDP}}$$

（六）衝突的蔓延性（contagion）

此變數亦為虛擬變數，即為觀察國家在當年，或前一年內，鄰國是否有發生國內衝突，⁵⁸若鄰國無衝突發生則為 0，若鄰國曾發生國內衝突則為 1。本文除了以「鄰國」衝突作為衝突感染性的控制變數外，本文另外也納入「區域」的感染力（編碼方式與鄰國感染力相同），但本文將 MENA 地區分為兩個區塊，中東以及北非，將地理距離分隔的考量勝過族群同質性的考量。

二、統計結果

本文有五個模型，統計的結果以及與依變數與自變數的關係請見表 2 與表 3。第一個模型除主要解釋變數外，另加入常被探討的因素（控制變數），包括了族群、自然資源，以及衝突的蔓延。統計結果發現「政體」是顯著的，且與衝突的可能性呈現「正相關」，即國家愈民主，發生內部衝突的機率愈大，這與吾人對民主可以帶來和平的普遍印象是背道而馳的；經濟因素也呈現顯著且負相關：人均 GDP 越高，衝突的可能性越低，經濟的開放程度亦然，當國家經濟市場對外越開放，衝突的可能性也越發降低。在控制變數方面，所有的控制變數除了「鄰國」的衝突蔓延效應外，都是不顯著的，包括自然資源的仰賴與衝突的「跨區域」蔓延效應。

註⁵⁷ Michael L. Ross, "Oil, Islam, and Wom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 102, No. 1 (2008), pp. 107~123.

註⁵⁸ 伊朗鄰國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阿曼；葉門鄰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曼以及吉布地；以色列的鄰國有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埃及與賽普勒斯；阿曼鄰國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葉門；蘇丹鄰國有埃及與利比亞；伊拉克鄰國包括伊朗、約旦、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以及科威特。

表 2 廣義估計方程式統計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世界銀行定義MENA國家			擴大MENA國家	MENA國家 (刪除土、賽與馬國)
	全部變數	倒U模型 主要解釋變數	倒U模型 全部變數		
政體	.0179412** (.0056237)	.0434131*** (.0115126)	.0357992** (.012881)	.028442** (.0110856)	.0377781** (.0123765)
政體 (平方)		-.0027262** (.0008929)	-.0016719* (.0009503)	-.000528 (.0006274)	-.001495* (.0008438)
人均GDP _{t-1}	-4.26e-06* (2.30e-06)	-7.62e-06* (4.07e-06)	-4.21e-06* (2.28e-06)	-2.55e-06 (2.20e-06)	-4.17e-06* (2.31e-06)
人均GDP _{t-1} (平方)		9.13e-11 (6.16e-11)			
經濟開放程度 _{t-1}	-.0017332* (.0009468)	-.0014895 (.0015236)	-.0020141** (.001)	-.0004084 (.0009445)	-.0029167** (.0010026)
經濟開放程度 _{t-1} (平方)		7.49e-06 (7.27e-06)			
族群	.0927765 (.1399705)		.0562196 (.1848159)	.0255477 (.171992)	.0139831 (.1890051)
自然資源租金占GDP 比例	.0019075 (.00147)		.0024228* (.001471)	.0013292 (.0014758)	.0031329** (.0014933)
石油租金占自然資源 租金比例	-.0658858 (.086273)		-.0586176 (.0863926)	.0334651 (.0410037)	.0617862 (.0707442)
鄰國蔓延效應	.1775448*** (.0494343)		.1711267*** (.0476025)	.2292706*** (.045244)	.2534758*** (.0456381)
區域蔓延效應	-.0624637 (.3033445)		-.086778 (.2908961)	-.0619492 (.3104018)	-.0936383 (.2971541)
Wald chi ²	30.43		30.84	52.35	59.2
觀察值	480	580	480	597	521

註：***p<.01 (變數顯著於 99%的信心水準)；**<.05 (顯著於 95%的信心水準)；*<.1 (顯著於 90%的信心水準)

表 3 本文主要以及控制變數與內戰發生的關係

	預期關係	實證結果分析	註
政體	倒U型分布	倒U型分布	符合預期
人均GDP	倒U型分布	倒U型分布	符合預期
經濟開放	- (負相關) 或倒U型分布	-	不屬於符合預期，但部分符合預期
族群	X (不顯著)	X	符合預期，沒有顯著關係
自然資源租金	+ (正相關)	+	符合預期
鄰國蔓延效應	+	+	符合預期
區域蔓延效應	+	X	不符合預期，沒有顯著關係

第一個模型顯示，國家愈民主，內部衝突的可能性愈高，這與民主的規範理論是不合的，因此作者以民主與衝突呈現「倒 U 型」的分布來建立第二與第三個模型。第二個模型檢視是否政治以及經濟因素均成「倒 U 型」分布，因此除了原編碼變數外，增加了政治（政體）以及經濟（人均 GDP 與經濟開放）的平方值。判斷該變數是否為非線性的倒 U 型分布有兩個指標：第一，原變數的係數呈現正值，而平方後的變數係數則是負值；第二，原變數係數的絕對值會大於平方後係數的絕對值，若符合以上條件，那們吾人可謂該自變數對依變數呈現「倒 U 型」分布。⁵⁹而模型二呈現出的結果證實，政體（民主程度）與衝突的分布是非線性的倒 U 分布，而經濟因素（包括人均 GDP 以及開放程度）則否。根據作者對政體的編碼，極威權（編碼為 0）到極民主（21），中間屬於過渡政體的情況下，倒 U 型模型中政體顯著的意義代表，第一，過渡政體，是最可能發生衝突的政體；第二，從極威權往過渡政體發展的過程中，的確衝突的可能性會增加，所以在倒 U 型分布的前段，民主化反而製造了動亂；第三，從過渡政體往民主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衝突的機率則是降低的，民主化對國家會產生安定的效果，從倒 U 型分布的後段可以獲得實證上的肯定。

模型三加入了控制變數檢視，而模型二證實了民主與衝突的分布成倒 U 型，但是經濟因素（包括人均 GDP 與經濟開放）均呈線性分布（如模型一），那麼模型三是預測此區最適合的模型：實證的結果證明，民主與衝突呈現倒 U 型顯著相關，而越富裕的國家，以及經濟市場越開放的國家，越不容易發生內部衝突（與模型一結果相同），而控制變數方面，自然資源對於衝突的詛咒是顯著的，對自然資源收入越仰賴的國家，越容易發生戰爭，而鄰國出現戰爭，本國被牽連的機率極高，但若有緩衝區的相隔，那麼衝突發生的機會似乎不是那麼可懼了。

模型四與模型五非主要模型，但作者擴大了取樣的國家，比較作者所提出的變數在不同取樣下的差異。模型四涵蓋 25 國，包括了除了世界銀行所定義的國家外，其他經常被含蓋在 MENA 的國家；⁶⁰而模型五則是將模型四內地理上大規模涵蓋的國家，扣除與歐洲較有淵源與地理上距離中東北非中心較遙遠的三國（土耳其、賽普勒斯，以及馬爾他），以 22 個國家作為採樣國家。⁶¹模型四意義在於，盡可能的擴大中東北非

註 59 Quan Li and Rafael Reuveny,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4 (2006), p. 942。

註 60 如果以地理劃分而言，位於北非北方的兩個島國馬爾他（Malta）與賽普勒斯（Cyprus）以及位於歐亞界線上的土耳其的經常被劃入 MENA 國家，但是這馬國與賽國的主要宗教都並非伊斯蘭教；而信仰猶太教的以色列由於本身即位於中東半島內，因此，即便是不同的宗教，大多數的案例仍會將以色列做為 MENA 國家討論；同樣地，若以宗教文化來劃分界線，非洲的索馬利亞（Somalia）、（北）蘇丹（Sudan），以及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等國也經常被劃入 MENA 國家討論。因此，若擴大樣本，模型四的 25 國家包括：Algeria, Bahrain, Cyprus, Djibouti, Egypt, Israel, Iran, Iraq, Jordan, Kuwait, Lebanon, Libya, Malta, Mauritania, Morocco,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Somalia, Sudan, Syria, Tunisia, Turkey, UAE, Yemen。

註 61 模型五的 22 國家為模型四扣除土耳其、賽普勒斯以及馬爾他三國，因此包括：Algeria, Bahrain, Djibouti, Egypt, Israel, Iran, Iraq, Jordan, Kuwait, Lebanon, Libya, Mauritania, Morocco, Oman, Qatar, Saudi Arabia, Somalia, Sudan, Syria, Tunisia, UAE, Yemen。

廣義定義的國家，在地理與國家數上盡可能的增加，資料也因擴大樣本數而更具有多元性，模型四的結果顯示，擴大國家的結果是所有的控制變數都不顯著，且主要變數的經濟變數也不顯著了，顯示本文的理論，似乎在擴大 MENA 國家的情況之下，會降低解釋力，特別是模型五將單一文化作為唯一採樣的標準時（扣除與歐洲地理與文化較深的國家）後，結果與主要模型（模型三）便一致了。

「政體」在全部模型中均呈現相關，但是與衝突機率的關係卻是呈現不同的方向。在作者假定政體與衝突為線性關係時（模型一），越民主的政體反而會造成更高的衝突機率，但是在作者加入政體平方這個變數後，發現民主與衝突機率是呈現倒 U 的關係，代表從極威權往極民主的道路上，過渡時期發生戰爭的機率是最高的，從威權到過渡政體發生戰爭的機率是正相關的成長，而從過渡政體到極民主的（衝突）機率是下降的，這樣的實證結果的確符合過去的文獻所述，過渡政體的時期是最混亂的。經濟因素的結果就較直接，經濟越發展、越開放，衝突的可能性就越低，此外，經濟發展對於與衝突不屬於倒 U 型的分布。至於控制變數，族群的因素在此區不具有統計上的影響力，而自然資源的詛咒似乎在此區亦可適用於國內衝突，自然資源所得占國家所得越高，統計上而言，衝突的機率也越高，但是自然資源中的石油所佔比例越高，卻非導致衝突可能性增加。最後，衝突的蔓延效應只限於「鄰國」，一旦跨國或跨區域後，衝突的傳染力便消失了。

肆、結 論

本文從回顧過去文獻所提及之影響內戰爆發的原因，來檢視 MENA 地區的國家內部衝突後發現，過去的理论可以解釋此區域內大部分的衝突，但是也呈現了 MENA 地區獨特的地方。首先，經濟發展一如過去文獻的論述以及一般的理解，人民獲得越好的生活水準，會直接降低國家發生內部衝突的機會，因為社會經濟上的不滿無法累積，於是發生衝突的機會也會降低，而衝突亦不會因為經濟發展暫時的改善而停緩，而會隨著不停的進步而越趨穩定。此外，作者也發現政府若採取較開放的經濟政策，也會降低社會混亂的可能性，首先或許是因為貿易開放對於經濟發展的貢獻，或許是由於政府以及民間對於自由貿易的依賴，增加了雙方對於衝突發生的脆弱度，也使得以暴力手段作為解決問題方式的機率大減，而政府對於經濟開放的決心，也傳達政府願意聆聽人民的不滿，而因此可降低內部暴力的發生。然而，另一個傳統因素卻呈現不同的效果，民主似乎並非此區內部衝突無副作用的解藥，民主化的過程在一開始的確是充滿血腥與暴力，而非線性的關係也可能暗示著，此區不民主的國家仍困於過渡政體，較難邁向民主。總之，民主未能代表此區對於和平的寄望，脫離威權的部分過程卻是暴力的，MENA 有著過去殖民以及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民主化的結果雖是西方國家所期待的，也導致了若強行在此植入民主過程中，會出現未受期待的陣痛期，吾人瞭解民主政治最終仍是相對良善的制度，但是從過去的研究，到本文對

MENA 地區的實證發現，民主化的確有可能是衝突的起因。然而，本文的結論並非認為民主在此區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們並不能忽略衝突的發生，在西方國家敦促以及推行民主化的過程中，國際社會同樣具有道德上的義務必須密切觀察並審慎的處理可能發生的動亂。

另外，作者針對 MENA 地區特色，再輔以三個控制變數來解釋此區的內部衝突。第一，族群在過去的經驗中，並非此區衝突的因素，而本文的結果也證實了這點。第二，MENA 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學界又素有以自然資源為目標來討論經濟發展，而這又恰恰與內部衝突的爆發有顯著的相關，因此，在檢驗此區的自然資源與國內衝突後，本文發現，的確，自然資源對國家內部穩定具有負面效果，自然資源占國家收入越高時，發生內部衝突的機會越高，在 MENA 地區的經驗是如此。然而，即便自然資源對於國家內部穩定仍是種「詛咒」，但卻無法將此論述完全歸咎到石油，至少石油所帶來的收入占一國天然資源收入的多寡，並不影響衝突的爆發，因國家建設而讓人民獲利所繳交的稅越多，也可以肯定政府對國家建設以及人民福利的努力，因此減少衝突的機會。此外，此次由突尼西亞所開始的阿拉伯革命，從北非蔓延至中東地區，這樣的連鎖反應似乎備受重視，本文以 1946 年起此區的國家內部衝突為觀察值，同樣肯定了衝突的感染力，但是本文同樣證實，這樣的蔓延僅限於國家間相連的邊界，卻消失於過於遙遠的距離（跨國或區）。例如本研究發現，MENA 地區若一國發生內部衝突，鄰國遭受同樣衝突發生的可能性會增加，但若衝突發生僅在「本區」（例如中東地區或北非地區）而非鄰國，那麼會同樣遭遇衝突的機會變不存在，因此，本文認為，疆界對於衝突的感染力是顯著的。然而，2011 年底開始的革命是跨區的，可能部分歸功於現今網路世界資訊流動的快速以及無國界的特性，因此，或許在未來衝突的發生，國界的影響將逐漸模糊，但至少在本文的資料中，國界還是重要的，因此，國際社會對於一國內戰衝突坐大，若不願衝突繼續蔓延，那麼干預的手段似乎就是必要的。

從 MENA 的例子得知，經濟發展在此區是可以繼續努力的，高所得的生活可以降低衝突發生的可能性，而衝突的蔓延就目前的案例來看，多被限縮在鄰國的傳染而已；另一方面，民主的推廣則必須非常小心，對自然資源收入的依賴也必須持續觀察，因為這些因素對 MENA 地區，都是導致衝突的潛在因素。最後，回應本文的副標題所討論的，是民主或經濟的革命嗎？本文的主張是，根據實證，暴力的確是對經濟生活上不滿的累積，但是卻未必都是對民主的追求，至少在非線性的分布之下，我們無法完全歸咎於此。

*

*

*

The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Regions

Szu-Ning Pi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Arab Spring occurred in the end of 2010,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regions have drawn atten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cause of turbulent domestic events. Some nations in this area have leaders who stay in office for a very long time (e.g. Libya and Egypt), and some nations suffer from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e.g. Algeria). Therefore, this study tries to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civil war, focusing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to examine i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ffect the onset of internal conflict in the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the onset of conflicts. Autocracy is proven to be the most chaotic regime. However,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is decreasing as economy develop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wo regional factors –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 contagion in this study – and finds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 In this study, data are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TSCS), including MENA countries from 1946 to 2011, while The General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are applied as the econometric model.

Keywords: civil war,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參考文獻

- 林雅瑩，「中東民主化浪潮與未來挑戰之研究－從茉莉花革命探討」，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蔡秀勤、張佑宗，「阿拉伯之春的啓示與反思」，臺灣民主季刊，第8卷第3期（2011年9月），頁199~210。
- Armed Conflict Dataset (ACD), <<https://acd.iiss.org/en>>.
- ACD codebook, <http://www.pcr.uu.se/digitalAssets/124/124920_1codebook_ucdp_prio-armed-conflict-dataset-v4_2014.pdf>.
- Benmelech, Efraim, Claude Berrebi, and Esteban F. Klor,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Suicide Terroris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4, No. 1 (2012), pp. 113~128.
- Blattman, Christopher and Edward Miguel,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8, No. 1 (2010), pp. 3~57.
- Bleaney, Michael and Arcangelo Dimico, "Incidence, Onset and Duration of Civil War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redit Research Paper*, No. 09/08 (2009).
- Bremmer, Ian, *The J Curv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Why Nations Rise and Fal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Alastair Smith, "Leader Survival, Revolutions, and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Fin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4 (2010), pp. 936~950.
- Buhaug, Halvard, "Capability and Rebel Objective in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6 (2006), pp. 691~708.
- Buhaug, Halvard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Contagion or Confusion? Why Conflicts Cluster in 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6 (2008), pp. 883~901.
- Bussmann, Margit and Gerald Schneider, "When Globalization Discontent Turns Violent: Foreig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07), pp. 79~97.
- Bussmann, Margit, Gerald Schneider, and Nina Wiesehomeier, "Foreign Economic Liberation and Peace: The Case of Sub-Saharan Af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4 (2005), pp. 551~579.
- Cable News Network (CNN), <<http://edition.cnn.com/>>.
- Cederman, Lars-Erik, Simon Hug, and Lutz F. Krebs,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 Wa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4 (2010), pp. 377~394.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 No. 56 (2004), pp. 563~595.
- Correlates of War (COW),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 de Soysa, Indra and Hanne Fjelde, "Is the Hidden Hand an Iron Fist? Capitalist and Civil

-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3 (2010), pp. 287~298.
- Easterly, William and Ross Levine,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 No. 4 (1997), pp. 1203~1250.
- Eifert, Benn, Edward Miguel, and Daniel N. Posner,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2 (2010), pp. 494~510.
- Elbadawi, Ibrahim and Nicholas Sambanis, “How Much War Will We See? Explaining the Prevalence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3 (2002), pp. 307~334.
- Europa World Online, <<http://www.europaworld.com/pub/>>.
- Fargues, Philippe, *Emerging Demographic Pattern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Migration through 2030* (Washington, D.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08.).
-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p. 75~90.
- Gates, Scott, “Recruitment and Allegiance: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Rebell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1 (2002), pp. 75~90.
- Gates, Scott, Havard Hegre, Mark P. Jones, and Havard Strand, “Institutional Inconsistency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Polity Duration, 1800-2000,”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4 (2006), pp. 893~908.
-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Local: The Diffusion of Conflict,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and Andrea Ruggeri,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3 (2010), pp. 299~310.
- Gleditsch, Nil, Peter Wallensteen, Mikael Eriksson, Marggareta Sollenberg, and Havard Strand,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9, No. 5 (2002), pp. 615~637.
- Gylfason, Thorvaldure,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4-6 (2001), pp. 847~859.
- Hegre, Havard, J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eter Gleditsch,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No. 1 (2001), pp. 33~48.
- Hegre, Havard and Nicholas Sambanis,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mpirical Results on Civil War Onse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4 (2006), pp. 508~535.
-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 University Press, 1968).
- Kathman, Jacob D., "Civil War Contagion and Neighboring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10), pp. 989~1012.
- Li, Quan and Rafael Reuveny, "Democrac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4 (2006), pp. 935~956.
- Liang, Kung-Yee and Scott L. Zeger,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Using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Biometrika*, Vol. 73, No. 1 (1986), pp. 13~22.
- Mann, Michael.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5~38.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1995), pp. 79~88.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297~337.
-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PMIT Press, 2005).
- Marshall, Monty G. and Keith Jaggers. *Polity IV Dataset* (College Park, M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D, 2002).
- Miguel, Edward, Shanker Satyanath and Ernest Sergenti, "Economic Shocks and Civil Conflict: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4 (2004), pp. 725~753.
- Montalvo, Jose G. and Marta Reynal-Querol, "Ethnic Polarization, Potential Conflict, and Civil Wa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795~816.
- Muller, Edward N and Erich Weed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Violence: A Rational Action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4, No. 4 (1990), pp. 624~651.
- Polity IV Project,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 Ross, Michael 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2 (1999), pp. 297~322.
- Ross, Michael L., "What Do We Know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1, No. 3 (2004), pp. 337~356.
- Ross, Michael L. "Oil, Islam, and Wom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2, No. 1 (2008), pp. 107~123.
- Sachs, Jeffery D. and Andrew M. Warn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Issue 4-6 (2001), pp. 827~838.

- Schneider, Gerald, and Nina Wiesehomeier, "Rules that Matte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iversity—Conflict Nexu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5, No. 2 (2008), pp. 183~203.
- Snyder, Jack.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 Steinberg, David, and Stephen M. Saideman, "Laissez Fea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on Ethnic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2 (2008), pp. 235~259.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llan C. Stam III, Carole Alsharabati, Mark A. Abdollahian, Brain Efird, an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Y: 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 Themner, Lotta and Peter Wallensteen, "Armed Conflicts, 1946-201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4 (2012), pp. 525~536.
- van de Ploeg, Frederick, "Natural Resources: Curse or Bless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9, No. 2 (2011), pp. 366~420.
-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
- World Bank, *The Changing Wealth of Nations: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1),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NVIRONMENT/Resources/ChangingWealthNations.pdf>>.
- World Factbook,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